

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李华兴

(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上海 200233)

[摘要] 容闳是中国留学美国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是容闳毕生的追求。从率领幼童留美, 完成“中华创始之举”, 为社会转型提供一批栋梁之材; 到引入“制器之器”,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国外引进成套先进设备, 为近代机器制造业奠基; 再到同情太平天国起义, 参预戊戌变法维新, 促进辛亥革命, 走在社会政治变革的前沿——容闳的认识与实践, 表明他一生追求光明, 与时俱进, 无愧为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关键词] 容闳 留学教育 政治变革 中国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5)05-0046-007

犹如山间高耸的峰峦, 时而被云遮雾障, 但终究会显露其真容一样, 历史上先驱者的丰碑, 也往往会被遗忘或扭曲, 然有朝一日, 终将恢复其本来面目而受到应有的评价和敬仰。怀抱赤子之心, 力图“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的容闳^②, 就是这样一座矗立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由隐而显的先驱者的丰碑。

破冰之旅：中国留学教育之父

综览一个半世纪以来, 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农业走向工业、由专制走向共和、由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 人们不难发现, 留学生是一支队伍虽小, 但却辐射广、效益高、影响大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学成归国的留学生, 就其总体和主流而言, 不仅是晚清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排头兵, 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教育、科技、移风易俗等各个领域, 充当了谋求现代化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饮水思源, 人们不能不对 1854 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对终身致力于派遣留学生计划并于 1872 年率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 完成“中华创始之举”和“古来未有之事”^[1-p9]的容闳, 产生莫大的崇敬之心和由衷的缅怀之情。

早在 1854 年大学毕业前夕, 容闳已把“将来应行之事, 规画大略于胸中”^[2-p23]。他认定, “我决

[收稿日期] 2005-5

[作者简介] 李华兴(1933—), 男, 武汉市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23 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1909 年, 容闳完成自传性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同年 11 月在美国出版。1915 年, 由徐凤石、恽铁樵以“新民体”节译成中文, 书名《西学东渐记》, 最初在《小说月报》第 6 卷 1—8 期发表, 旋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按此译本校点重印, 并补译容闳“自序”和特韦契耳(Joseph H. Twichell) 牧师演讲作为“代跋”, 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其后, 经王蓁重译全书, 取名《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 199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再后, 又有石露译注的《容闳自传—我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 于 2003 年由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

② 容闳, 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 原名光照, 族名达萌, 号纯甫, 英文署名 Yung Wing, 生于 1828 年 11 月 17 日(清道光八年十月十一日), 卒于 1912 年(民国元年)4 月 21 日。容闳家境贫寒, 渔农为生, 1840 年 11 月入澳门玛利逊学校念书, 1847 年 1 月随该校校长布朗博士赴美留学。1854 年夏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 成为中国留学美国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 同年 11 月回国。

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此目标犹如一颗明星，时刻指明我前进的方向。”“不管有多少艰难坎坷，也不管人生的浮沉盛衰，我都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忠贞不渝”^[3]。虽然，最早奏请清政府向西方国家选派留学生的人并非容闳；但顺应时代需求，具体倡议、亲手经办并促成此事的，首功当推容闳。无怪乎，人们尊称容闳为中国留学教育之父。

1863年(同治二年)，拣选知县桂文灿向清廷奏陈：“闻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确，日本必强，有明倭患，可为预虑。学习制造船炮等法，我国家亦宜行之。”对此，总理衙门总领大臣奕訢表示赞同，但又以为“此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因而“尚未尽合机宜”^[4]。1865年3月，奕訢就派遣旗兵赴外国学习军器制造一事，密商于李鸿章。5月，李回函说，派人出国留学，“以理与势观之，亦为将来必有之举，鸿章盖尝默存此见而未敢倡为是论。”^[5]可见，当时的朝廷重臣与封疆大吏奕訢、李鸿章等，也意识到派人出国留学乃“将来必有之举”。正是这个背景和伏因，为容闳成就其留学教育计划准备了必要条件。

慑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出于了解列强和御侮图强的愿望，1866年3月，总理衙门奏派知县斌椿率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随英人赫德“赴泰西游历”；次年，又派志刚、孙家鼐随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两批考察的共同结论，可于曾国藩、李鸿章的联名奏折《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中见及：西学“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有鉴于此，曾李奏议，中国应“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p87,86]

当机会逐渐降临之时，容闳及时采取了行动。1868年，经老友江苏巡抚丁日昌之手，容闳向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转递了自己的四则条陈。内中，最核心的也是容闳“望其必成”的是第二条：“政府宜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120名学额以试行之。此120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30人。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须以12岁至14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2-p86~87]在容闳心目中，千方百计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2-自序]

好事多磨，容闳的留学计划因文祥“丁忧”而暂时搁浅，但却因丁日昌的热心推荐和容闳留美的特殊经历、经办洋务的有胆有识，而备受曾国藩、李鸿章关注。1870年6月(同治九年五月)爆发的“天津教案”，使中国蒙受极大羞辱，然而“夷夏之防”的难以为继，又从反面推进了中国人走出国门的步伐。同年，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四人联衔上奏，请准选派聪颖子弟出洋留学。1871年初春^①，清廷采纳奏折，朱批“着照所请”。“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2-p91]

“公元1872年8月11日，农历七月初八。这批年龄在9岁到15岁的少年，在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他们中的50多人，曾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6]一向以拥有四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傲，“纵横四顾，常觉有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之概”^[7]的中国，记忆中仅有日本及周边邻邦“师唐”之荣耀，如今却在遭逢千古未遇之奇变后不得不放下架子，派聪颖幼童出洋留学，以冀借“师夷”“徐图自强”。坚冰终于打破！作为留学教育的开路先锋，容闳神往的前景是，通过政府有计划地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将使此老大帝国变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中国”^[3-p162]。

① 曾国藩奏折照准时间，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1页记为“1870年冬”。但据石霓译注的《容闳自传》第179页考证，应为“1871年初春”。后者比较准确。

如果说,从19世纪60年代起,留学教育已是躁动于“自强新政”母腹中的胎儿,那么,容闳便是他的催生婆。1927年,舒新城先生写的《近代中国留学史》,十分中肯地评价说:“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无留学,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8]

教育救国的先行者与大贡献

“教育救国”论是近代中国特殊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是民族危机和忧患意识的共同产物。在放眼世界、中西比较的深层思考中,在探究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原因何在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是中国民族危机的真正根源,而弥补这种落差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教育;只有通过发展教育,将西方文明融变为中华民族的新文明,才能从根本上纾解民族危机。于是,“教育救国”论应运而生。

从纵向考察,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论的滥觞。冯桂芬“采西学”、“制洋器”的呼喊,是希望通过发展教育与科技,使中国得以“久安长治”、“雄长瀛寰”。清政府兴办的洋务教育,则是“师夷制夷”论不成功的尝试。透过惊心动魄的民族危机,人们逐渐意识到了更深刻的教育危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有识之士尖锐地指出:传统教育与科举制度“无用无实”,人才危机才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他们决心以西方近代学校教育与科学技术为参照系,从废除科举与改革学制入手,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加快中国争取独立、富强的前进步伐。1881年,钟天纬即已强调:“夫治国全在人才,求才须由学术。”^[9-163]“中西学问消长之机,亦即国势盛衰强弱之所由判。”^[9-168]90年代初,郑观应更将近代“教育救国”论推向极致,他透辟地指出:“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盛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10]

值得注意的是,远在大洋彼岸新大陆留学的容闳,虽在出国八年(1847—1854)期间,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取得了耶鲁大学文学士的毕业文凭,但是,他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2-自序]。中西文明的反差,国力强弱的对比,“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促使容闳在大学时代便立志教育救国,“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并于毕业前夕萌发了由政府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1854—1872年间,容闳全身心地倾注于教育计划的设计与实施,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从上可见,由于身处异邦他乡,且未有相关论著(尤其中文著述)问世,因而容闳并非中国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始作俑者和传播者,他的历史定位应该是:不仅开了近代“教育救国”思潮的先河,更是近代“教育救国”论最有成效的实干家。就教育和培养人才的角度分析,容闳对中国近代化所作的开创性的重大贡献,永垂青史而不朽。留美幼童归国后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便是有力的佐证。

留美幼童抵达新大陆后,分散入住当地民家。在语言和学业迅速进步的同时,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风尚习俗和宗教信仰也改变了幼童的精神面貌。他们之中,有的脱下长袍马褂穿上西装,有的跟着房东上教堂进而信奉基督教,更有剪去辫子不愿再向留学生监督行跪拜礼的。出于东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和顽固势力的卫道心态,留学生监督吴子登处处吹毛求疵并向朝廷密告:“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为此,他建议“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而且“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2-p104]

1881年,120名留美幼童除因病客死异域、因故提前遣回和少数抗命不归者外,全体94名被勒令于8月8日、23日和9月27日,分三批从美国乘船返回中国。这批撤回的留美幼童,除詹天佑、欧阳庚2人刚从耶鲁大学毕业外,其他都分布在美国东部各大专院校,有的还只是高中生。那么,被朝廷视为“异类”,打入“另册”的留美学生,归国后是否“无益于国家”“有害于社会”呢?事实做了

反证。

据高宗鲁教授统计,这批归国学生后来分布的职业和岗位是:

国务总理 1 人	外交部长 1 人	侍郎 1 人	公使 2 人
外交官员 11 人	大学校长 2 人	教师 1 人	铁路局长 6 人
铁路官员 14 人	电报局长 4 人	电报官员 6 人	海军将官 4 人
海军舰长 4 人	海军军医 3 人	海军军官 8 人	转入商界 8 人
工矿产业 7 人	兵器工厂 2 人	报业 1 人	海关 1 人
政府公职 7 人	律师 1 人 ^①		

他们之中,“有赫赫政界人士,也有为国捐躯的海军军官。有的功成名就,也有的在中国铁路及电报局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11]其佼佼者如: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著名铁路工程师、中华工程师会首任会长詹天佑;清末外务大臣梁敦彦;首任驻美公使、交涉退还“庚款”的梁诚;首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荃;参加中日甲午海战,民国初年升任海军高级将领的蔡廷干、徐振鹏、曹嘉祥、吴应科;全国电政总局局长周万鹏;开滦煤矿工程师吴仰曾;民初驻英公使刘玉麟;著名律师张仁康等。有的留美学生在中法战争七星塔战役中壮烈牺牲,如杨兆楠、黄季良、薛有福、邝咏钟;有的则在中日黄海大战中以身殉国,如致远舰大副陈金揆。显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留美归国学生在中国向西方学习和加快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大贡献,发挥了难以替代的排头兵和推进器作用。“他们促进中国的富强进步,而且使中国跻身世界友邦之中。”^[12]——一位留美学生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引入“制器之器”,为近代工业奠基

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曾国藩(1811—1872 年)是一个地位特殊并在史学界引发激烈争辩的人物。他以卫道者名世,却又超越了传统;他竭力保守旧物,却又引入了西方科技;他是旧营垒的“中兴名臣”,却又以新思考和“自强新政”挖了旧墙脚。而在激发曾国藩产生新因子、新元素的过程中,容闳无疑是其新旧更替的触媒和催化剂。派出留美幼童之事,已见上文;引入“制器之器”,也离不开容闳在建言和运作两方面的贡献。

曾国藩在湘军和太平军的对阵中,已经见识过“西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1860 年 12 月 19 日(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八),他在《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提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3-p1292]这是洋务派也是曾国藩最早提出的,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1861 年,他又在奏折中强调:“购获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打算“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13-p1603]。为此,他在攻下安庆后当即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召集徐寿、华蘅芳等一时之选,不假西人,用手工试造船炮,跨出了国人接纳西方科技的可贵的一步。然而两年下来,尚无一艘轮船下水,所制山炮不甚合式,燃放炸弹未落地已先开花,致使曾国藩萌生建立“西式机器厂”之意。

1863 年 8 月,经李善兰等人推荐,曾国藩在安庆召见了容闳。当曾问及:“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时,容闳胸有成竹地回答说:“予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应先立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就是说,要造工作母机,由抓机械制造厂入手,建立基础工业。“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之物。”^[2-p75~79]这个建议,超越了原先被洋务官员普遍认同的“制器”层面,而突入“觅制器之器”的新境界,深受曾国藩赞许。随即,曾国藩手书记(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1863 年 12 月 5

① 此外,留美幼童中在美去世 4 人,不详 4 人,早年去世 13 人,在美工程师 1 人,美驻华使馆 2 人。

日)中便出现了“制器之器”的新词汇;尔后,更引发洋务派的共识:“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14]

两个星期后,容闳被曾国藩委以全权,领银68000两,于1863年12月离沪出洋,采购“制器之器”。1865年夏,容闳从美国马萨诸塞州普特南公司购办的一百几十台配套齐全、功能先进的工作母机运回上海,装备了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前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国外引入成套先进设备而建立的基础工业,对中国工业化的启动发挥了先锋和示范作用。对此,曾国藩“极为嘉许”并“专折请奖”,称赞容闳“历途万里,为时经年,备历艰辛,不负委托”,拟请特授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补用,以示优异,而励有功。”^[2-p84]

更有进者,1867年当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各项先进设备时,容闳“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予遂趁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容闳之所以在中国最早提出建立职业学校的倡议,是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拥有自己培养的科技人才,具有独立自主的机械制造业,那么,“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比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2-p85,73]这个预言,已被今日中国不少产品中成为“行业龙头”和“世界工厂”的事实所验证。一百多年前,容闳即有如此培养科技人才、掌握先进技术的真知灼见,可知其目光之远大,思虑之深邃!

从参预变法维新到促进辛亥革命

容闳是一位跨世纪的长寿老人。求学时期受西方教育民主科学的熏陶,基督教人道博爱的启导,欧美各国文明富强的感召,以及童年时代的贫困生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对清政府残酷屠杀人民和官场腐败的愤懑,在容闳头脑中构成两个世界的强烈反差。痛恨黑暗、向往光明的坚定理念,驱动容闳一辈子与时俱进,走在社会变革和政治近代化的前沿。

踏上祖国的大地,容闳在1855年夏天便目睹了两广总督叶名琛疯狂屠杀天地会起义民众75000人的血腥罪行,刑场“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容闳回家后,“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2-p30,31]1860年11月,容闳偕同两名美国传教士和一名中国友人,前往南京访察太平天国。在和干王洪仁玕见面后,容闳向太平天国提出了七条改革建议:“一、按照科学原则组建军队。二、创办武备学堂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三、创办水师学堂以培养海军。四、组织文官政府,由有才智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五、建立银行体系,厘定度量衡标准。六、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把《圣经》作为教科书之一。七、建立一整套实业学校体系。”^[3-p10]这些建议,是继洪仁玕《资政新篇》后,向太平天国政权提出的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上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治国方略。建议虽有不当之处(如将《圣经》列为教科书),但总体而言,其历史进步性与开创性不言而喻。

在逐渐蜕变的后期太平天国政权,容闳的七项改革建议当然不可能付诸实施。然而,容闳同情农民起义,认为“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且将革命的起因,归结为“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2-p6]确实切中要害。

容闳投身自强新政,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大端已见上文,此处不另赘述。

甲午战败,石破天惊。随着瓜分狂潮的迫在眉睫,容闳积极参预戊戌维新,认为光绪皇帝“颇思革新庶政”,有一番“励精图治之决心”。1898年,容闳在北京结识比他小30岁和45岁的康有为、梁启超。康梁以师礼尊容闳,容对晚辈的新政奏议表示认同,并参加了保国会的第一次集会。此后,容闳寓所成了维新志士经常聚会的地方。是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废,“新政”烟消云散,六君子被杀,康梁被迫逃亡,容闳“以素表同情于维新党,寓所又有会议场之目,故亦犯隐匿党人之嫌,不得不迁徙以逃生”^[2-p122],先避居上海租界,后经日本迁居香港。

百日维新虽然夭折,但容闳对中国的政治革新和光明前途并未失去信心。1900年,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京畿。与传统士大夫痛斥“拳匪”祸乱不同,容闳对义和团正面给予肯定,他说:“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15-p99]八国联军猖狂入侵,慈禧仓皇出逃西安。抓住有利时机,维新志士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准备在长江一带发动自立军起事。7月26日,唐才常拟用国会名义,号召国人奋起自救,在上海张园召集维新志士80余人开会。会议选举德高望重的容闳为正会长(42票)、严复为副会长(15票)。“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16]接着,容闳亲自起草了英文的对外宣言,送交驻上海的英国总领事馆。宣言表明,中国国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英国政府为模式的“立宪政府”;办法是“联合列强,废黜慈禧太后及其老朽顽固派和反动派同僚,恢复维新改良代表人物光绪皇帝的权力”^[17]。此时,容闳的政治观依旧倾向于君主立宪制。

值得注意的是,1899年容闳在迁居香港时期已与兴中会会员、爱国华侨谢缵泰交谊甚笃,并在与谢的倾心交谈中,开始了解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更巧的是,1900年9月1日,容闳在由上海去日本的“神户丸”上和孙中山不期而遇。两位香山老乡彻夜长谈,相见恨晚,容闳对立志推翻清廷、追求民主共和的孙中山印象深刻,认为“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予勛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15-p100]孙中山则推崇容闳为富有新思想、热心中国改革的“老前辈”。由此,两位先行者相交相知,互相支持。原先,容闳曾期待兴中会、保皇会和其他力量能联合起来,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但在1908年7月给谢缵泰的信中,他已抨击保皇会的政治主张,揭露康有为将华侨捐款中饱私囊,“并非一安全可靠之维新人物”^[18-p320];而对孙中山则赞誉有加,认为他很重实际,反清计划一定可以实现。从此,容闳与康梁决裂,走上推翻清帝的民主革命道路。

1902年,容闳74岁时由香港赴美国定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容闳为促进中国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除对华侨和美国进步人士进行宣传鼓动,揭露康梁和保皇会的伪善面目,号召人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之外,还积极筹募经费,制订详细计划,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1908年12月1日,容闳写信给美国友人、军事学家荷马李,要求他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次年12月,孙中山应容闳邀请到达纽约。这是他们相隔九年之后的第二次见面。容闳提出了一个名叫“红龙中国”的计划,准备募集500万美元、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统治,给了孙中山以巨大鼓舞^[19-p74]。这个计划虽因贷款未成而没能实现,但却透现了容闳以80高龄仍为民主革命鞠躬尽瘁的赤子之心。

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清王朝皇冠落地。容闳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他在一封信中,希望全体革命者“为解除人民的疾苦,去争取自由和独立”,“呼唤共和国的到来”。他特别提醒革命党人,不要屈服于大阴谋家袁世凯的压力,不能让那些政治两面派操纵中国的未来。最后,容闳在信中呼吁,全体革命者“应当彼此团结得比亲兄弟还要紧密”,为“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而努力奋斗^[19-p79-80]。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成功地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容闳大感欣慰,写信给谢缵泰,要求谢前往南京参加孙中山就职典礼时,“千万替我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请你告诉他,我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容闳赞颂孙中山“为中国和中国人奋斗了22年之久”,共和国缔造者的名字,将“铭记于人们的心中,当受到人们的纪念”^[18-p329]。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他就给自己非常尊重的“老同志”容闳寄上一幅照片,发了一份邀请函。函中以求贤若渴的挚诚提出:“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环宇,加以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奋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赐矣。”^[20]遗憾的是,接到孙中山来函时,容闳已因中风而不能行动,无法再回国效劳;但在弥留之际,仍将接力棒传给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两个儿子,叮嘱他们代替老父“回报祖国”。容闳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感人至深!

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逝世,享年84年。他被安葬在西郊雪松山公墓。容闳的好友特韦契耳牧师,1878年就曾以赞美诗般的语言,未盖棺而先论定,颂扬容闳具有“对祖国最强烈的爱国愿望——因为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2-代跋p15]。从领航“破冰之旅”,立志教育救国,引入“制器之器”,到同情太平起义,参预变法维新,促进辛亥革命,容闳以他一生与时俱进的光辉实践,实实在在地证明,特韦契耳的评价经得起严格的历史检验。

容闳无愧为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炎黄子孙将永远敬仰这座丰碑!

[参 考 文 献]

- [1] 曾国藩、李鸿章. 奏遣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Z]. 陈学恂、田正平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Z].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 [2]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3] 石霓译注. 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 第45页,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
- [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Z]. 卷十五,第32页. 北京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
- [5] 李鸿章致总署函[Z].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海防档·机器局(一)[Z]. 第13页,1957年版.
- [6] 钱钢、胡劲草. 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M]. 第2页.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 [7] 梁启超. 新民说·论进步[M].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 第56页.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 [8] 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史[M]. 第2页,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
- [9] 钟天纬. 与程禧芝书[Z]. 别足集·内篇[Z]. 长子钟镜寰、长女钟镜芙校订,上海1932年(壬申年)出版.
- [10] 致伍秩庸先生书[Z]. 郑观应集[M]. 下册,第2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11] 高宗鲁. 容闳与中国幼童留美[A].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M]. 第451—452页,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
- [12] 高宗鲁译注.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Z].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转引李喜所.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 第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13] 曾国藩全集[M]. 第2册. 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 [1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Z]. 卷二十五,第10页.
- [15] 刘成禺. 纪先师容纯父先生[Z]. 世载堂杂忆[Z].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 [16] 孙宝瑄. 日益斋日记[Z].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Z](一)第540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 [17] [美]周锡瑞. 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M]. 第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18] 谢缙泰.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19] 顾长声. 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20] 孙中山. 致容闳函[Z]. 孙中山全集[M]第2卷,第1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Rong Hong: The Outstanding Pioneer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 Hua-xing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5, China)

Abstract: Rong Hong is the first Chinese student studying in America. He devoted his whole life in pushing China on the road to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by bringing in the Western knowledge. The first group of children studying in America headed by him was a great undertaking, which provided talents for the transition of society. The complete sets of advanced equipment firstly imported by him established the basis for the modern machine building in China. Rong Hong sympathized with the Taiping Revolution, participated i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nd promote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lways standing on the frontie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olutions. Rong Hong pursued brightness and kept up with the pace of time all his life, worthy of the title of the outstanding pioneer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Rong Hong; overseas education; political revolu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周珉]